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SHIXUE GAILUN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学 概论

滕方炜 许海清◎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学概论

滕方炜 许海清◎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概论/滕方炜,许海清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035-5160-4

I. 中… II. ①滕… ②许… III. 中国历史—
现代史—史学—概论 IV. 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996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概论

责任编辑 王 君 任 丽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高 鹏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62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序 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中，至今尚未见到一部论述国史研究的著述，这与国史研究的时代要求显然是不相符的。正因如此，在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概论》这本书稿时，感觉到的是一种欣慰。这本书虽然仅有十几万字，但它对国史研究中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关注，对国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使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基本概念、基本任务、国史研究的理论指导等主要问题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认识，对当前国史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有了更多的思考。这对国史研究来讲，无疑是填补空白之著。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前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总书记的讲话，对国史研究来讲，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无论于世界，还是于中华民族，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中国的影响愈加重

要，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加广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对新中国的研究工作也迅速展开并逐步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总计6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个时间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年轻的共和国。然而，在这60多年里，新中国的发展变化也受到国内史学家的关注、思考，在各方面的重视和推动下，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大批有民族责任心、国家使命感的历史学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而认真的思考，形成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史学研究成果，为新时期的国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当中，既有对共和国前进历程的记载，也有对新中国史学建设的深入思考；既有对建国以来所取得成就的关注研究，也有对发展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既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有力指导，也有对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吸收借用；既有与西方史学界的交流学习，也有对自身史学建设的反思。这些工作不仅丰富了国史研究内容，而且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开阔了研究视野，对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国史研究的基础性成果比较丰富，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历程的记录、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等等，都有着大量的研究成果。二是国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以及各项改革工作的深入，促进了国史研究的新发展。国史研究的视角不断扩大，国史研究逐步从泛政治化的条框中脱离，走向学术独立，自身体系也由以前的模糊不清变得日益清晰明确。三是史学研究对外交流日益增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西方史学理论被国内学者引进和借用，为国内史学研究注入清新之风。同时，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

稳步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国外对中国的研究也成为热点，中外史学界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借鉴，推动了新时期国史研究的发展。

国史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史学研究队伍，还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更要有强力的科学史观作指导，这样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国史研究，使国史研究能够与时俱进，更好地为国家、为民族服务。就目前国史研究状况来看，与国家发展和时代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对国史研究的深度还不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虽只有短短 60 多年时间，但是在这 60 多年的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风雨曲折，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所战胜的艰难困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企及的。这为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文本和研究内容，也是国史研究中难得的宝贵财富。从目前国史研究的状况看，主要集中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虽然很丰富，但是，在研究深度上还不够，研究方法相对单一，问题意识相对缺乏，一些结论简单化、雷同化，缺乏新视角。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史研究的最大成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国史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崭新的视角和方法来进行史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在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被介绍、应用到国内史学研究以后，在史学研究中出现了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顶礼膜拜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错误倾向。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简单化、庸俗化的教条主义，还是归错般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全盘否定，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错误理解。因此，若要把现代史学研究开展、建设好，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科学性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研究，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先进性，这关系到国史研究的方向问题。三是国史研究的方法理论有待于进一步丰富。目前，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对全球史学研究有着广泛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史学研究的方法理论显得单一、薄弱。然而，若对西方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进行分析，无论理论的内核，还是思想的开放度与广阔度，抑或是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均没有超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思想，其诸种史学方法在我国传统史学研究中也早已应用。不同的是，在现代史学研究中，西方史学家对历史的思考更为深入，更为细致，更为具体，把史学研究所运用的各种方法予以放大而成为一个体系。而国内史学研究由于受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现代史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史学方法研究上关注不够、积累不够，因而落在了西方学者的后面。但是这并不说明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一定是先进的，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是落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时代性有待于在今后的史学研究中进一步认识、进一步深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概论》这本书，在关注国史研究基本问题的同时，对当前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也进行了思考，比如，当代中国史学思想的内涵是什么，当代中国史学思想的特征是什么，国史在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对于当前国史研究来讲，都是非常难得的，也是这部书稿的又一价值所在。

是为序。

目

录

序 言 /001

1

第一章 国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对象和任务 /001

一、国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 /001

二、国史研究的对象与任务 /008

三、国史研究的重要性 /017

2

第二章 国史的价值与功能 /026

一、国史的科学价值 /026

二、国史的功能 /034

3

第三章 国史研究的脉络与成就 /043

- 一、国史研究的起步与徘徊期（1949—1978年） /044
- 二、国史研究的兴起与繁荣期（1978年至今） /049
- 三、国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061
- 四、境外当代中国史研究情况 /064

4

第四章 国史的主线与分期 /075

- 一、历史主线与分期的关系 /075
- 二、国史的主线 /081
- 三、国史的分期 /085
- 四、国史的发展主流 /094

5

第五章 国史与党史 /099

- 一、国史与党史关系问题的由来 /100
- 二、党史决定着国史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105
- 三、国史有着更为广阔的学科视野 /110

6

第六章 当代中国史学思想特征及创新 /113

- 一、以史治鉴的史学教育思想 /113
- 二、唯物史观的确立运用 /118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的思想创新 /123

7

第七章 国史研究的方法 /131

- 一、史料的研究 /131
- 二、历史记述 /135
- 三、史学方法 /137

8

第八章 加强国史学习研究的思考 /146

参考文献 /153

第一章 国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对象和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总共也就60多年时间。如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放在中国史学几千年延续传承的整体视野中来看，它无疑是中国史学领域最年轻的一门新兴学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中国历史赋予了划时代的深远意义。新中国不仅在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权理论等各个方面与旧制度、旧传统相区别，在史学研究上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问题。比如，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繁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式微？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当代中国史有何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对象和基本问题是什么？应当如何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国史研究所要关注和解决的基本问题。

一、国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

进行国史研究，首先需要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当前，在国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基本概念语意不清、界限不明、使用不当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概念运用上的混乱，也使人们对国史的基本研究产生了模糊的、混乱的认识，不利于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必要进

行明确的辨析。

1. 国史与国史学

关于国史的概念，目前来看，有两种提法。一种是用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简称。学者朱佳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称谓有过明确论述：“国史，顾名思义，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一种是对中国史学的统称，如钱穆在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著述中，把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统称为国史，这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有着直接的体现。

从以上的提法和用法中可以看出对于国史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二是指中国有史以来的整个中华民族史。这两者的历史时间跨度、概念内涵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就概念使用而论，国史开宗明义，即为一国之史。那么何又谓“国”？《现代汉语词典》对“国家”的概念进行了简明解释：“①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兼有社会管理的职能。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②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若从国家的概念来看，国史可以明确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然而由于历史传统，以及人们在历史文化中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在很大范围上，惯于把整个中华民族称之为“中国”，在史学研究上，也就把华夏有史以来的历史统称为“国史”或者“中国史”，涵盖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演变与文化传承延续。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说道：“中国近来，史学颇有进步。吾人今日研究中国古代史所持之观点，与前人不同。吾人今日对于中国古代之知识，与前人所知者亦大异。”在这里，冯友兰将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思辨思想，以

“中国哲学史”而概之，既体现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又不至于与当时民国历史研究产生字义的重叠异义。

若以学术规范的角度分析，二者本应予以明确的区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新延伸、新发展，在实际表述应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以简称为“国史”，换言之，“国史”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表述，一来便于表述应用，若全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来表述，于行文则过于烦琐，不为精练。二来可以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时代性和重要性。对于华夏以来的历史，则可以称之为“中国史”或者“中华史”，既体现了对华夏以来历史的包容性和涵盖性，也避免了与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混淆。就目前的历史研究而言，对于以前各个朝代的历史研究基本上都以其朝代名称而称名，以朝代更替依序定名为周史、秦史、汉史、三国史、隋史、唐史、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综合考虑历史研究的时代性和侧重性，则可以简称为“国史”。

对于国史研究，在较为正式的学术称谓上，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称名，如费正清所著的《剑桥中国史》中，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相称。在具体的著述论章中，可以以说明的方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为“国史”，如朱佳木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一文中，文章题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来命名，在具体论述中，则以说明的方式予以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是一门相对年轻的新兴学科。”这样正名与简称相结合的方式应当更为妥切。

国史研究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历程作为研究对象。国史学，就是将国史研究的主体

活动作为学科对象，对国史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等进行整体审视与研究的一门学科。国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包括以下研究内容：一是国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诸如国史、中国现代史、当代中国史、国史研究等基本概念的界定；二是国史研究的对象与范畴，要对国史研究的基本内容进行框定和明确；三是国史研究的方法，包括史料的收集、考证、比较等诸多方法的应用；四是国史研究的价值与功能，对国史研究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以及资政育人功能进行研究；五是对国史研究从理论上予以总结归纳，借鉴国外史学理论，以更好地指导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六是对国史研究的分支学科建设进行指导，如国史研究中的史料史、社会史、人口史、经济史等，在国史研究中建立条缕式的学科分支，以便系统、全面地反映国史研究全貌，推进国史研究深入开展。

2. 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与中国当代史

许多国家都很重视自己的历史，但对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的内涵，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界定也不一样。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把1840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岭，把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当代中国史的开端。其实，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三个概念从字面上看是大同小异的。在我国作这样的区分，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主要原因在于就我国国史研究来讲，在相关历史时限的划分与界定上存在着一些混乱和分歧，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存在若干种不同的理解和称谓，既给人们造成认知上的混淆不清，也不利于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必要加以分析明确。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者朱佳木有过明确而合理的分析，即“把

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岭”，这一划分法，就把中国近代史的上限予以了明确。之所以这么划分，是依据社会性质的变化。1840年是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分水岭，作为大跨度的历史分期，依照社会形态的性质变化而分，无疑是十分科学合理的，这一划分法也得到了史学界的广泛认同。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断定则显得有些混乱。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国史学界和教育界曾经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和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对于这样的划分，不少学者建议，应将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由原来的1840年至1919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改为1840年至1949年，并将中国现代史的起点由原来的1919年推迟至1949年。著名史学家胡绳1997年在一封信里写道：“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80年和这以后的30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朱佳木也认为，以五四运动为界“虽可突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但却忽略了社会性质问题，混淆了革命史与国家史的界限”。这个论述，不但对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界的不当之处进行了明晰，更进一步指出导致这样错分的原因是混淆了革命史与国家史的区别，对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无疑是十分可贵的。必须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不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而且使中国结束了长达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上了真正民主、独立、自强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性质的这一改变，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划分界点。目前，对于

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划分在史学界已基本上形成共识：即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同时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上限和起点，这个划分方法在史学界已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

在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界限区分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对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几个概念进行明辨。就全球史范围来讲，当代史大致表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变化。二战后，许多国家推翻了旧的政权系统，成立了新的民族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讲，当代史是从新的国家政权成立开始的，表示国家进入独立发展的历史时期。各国当代史的具体时段不同，历史情况各异。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史学称谓：或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或当代中国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国史，称谓诸多，造成人们著述上的混乱。同时，在国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上也出现多种表述，如1980年在河南郑州成立了中国现代史学会；1990年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1992年12月成立国史学会；1994年5月1日《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当代中国史》专辑。对于这些名称不一的各种称谓如何进行界定？齐鹏飞认为：“均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历史时限的上限的中国现代史、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三个名词的内涵和外延是重合的，是可以互换和通用的。”朱佳木认为，统一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把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水岭，在这个前提下，“再把中国现代史与国史、当代史合并。合并后，可以称‘中国现代史’，也可以称‘国史’或‘中国当代史’。”由此可见，对于这些诸多的称谓，史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即无论是中国现代史的表述，还是中国当代史、当代中国史的表述，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的表述，其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以及

后延的历史过程，是对同一长段时间下的历史关注，是可以通用的。近期被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采用为教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就是这样分期的。

当然，如果以严格学术意义上的划分，这几个概念之间又有着细微的差异和不同。就概念外延来讲，国史在时间、空间的统一下更侧重于地域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管辖权之内的历史。而当代中国史则在明确特定空间的同时，更侧重于时间性。因此，在概念表意上，国史具有“内敛”性，而当代中国史却具有“发散”性和“扩延”性。在国史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对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性、整体性、长远性影响史域的研究，侧重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的研究，也更能体现历史“史鉴”功能。而一个村落的发展史、变迁史，虽然也是国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其微观性，显然不能作为国史研究的主干，而只能作为国史研究大体系下的一个小分支，对于这样的历史研究，将其归于当代中国史似乎更为合适。李良玉认为：关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学术界分别使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等概念。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历史学学科的意义属于断代史，按照传统断代史的定义有一个下限的问题，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因此，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断代史，可以称为中国当代史。

这些区分和厘辨对于澄清概念、促进国史研究都有着积极意义。但事实上，对于国史研究中相关概念的厘清，其中的内涵外延均有纠结缠绕，若细细斟酌，虽难以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但是应该能够就基本的外延与内涵，在实际研究应用中予以具体地明确。考虑到在实际研究和应用中，国史、中国现代史、当代中国史所表述概念上的差